

帛书《易传》研究综述

王化平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重庆 400715)

摘要: 本文共分“帛书《系辞》研究综述”、“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篇研究综述”、“帛书《繆和》、《昭力》研究综述”三个部分综述了帛书《易传》的研究情况,在每一部分中,文章又以研究主题为线索,分别介绍学界的研究成果。文章在最后介绍了研究帛书《周易》的几部论文集和专著。

关键词: 帛书《系辞》;《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繆和》;《昭力》

中图分类号: K87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7)06-0020-05

通常所说的帛书《易传》包括帛书《系辞》、《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繆和》、《昭力》,一共六篇。前四篇的释文刊发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后两篇刊发在《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上。在这些释文发布之后,又有多位学者所作的释文在《国际易学研究》等书刊上发表,到目前为止,《要》篇的释文最多,《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公布的是陈松长、廖名春二位先生共同署名的释文,池田知久先生的释文刊于《周易研究》,其后又有郭沂先生的释文。《繆和》、《昭力》共有两种释文,释文之间的差别很大,《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上的释文为陈松长先生作,其后廖名春先生在《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上发表了自己作的释文。

由于帛书《易传》的重要性,学界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下文仅就本人目力所及,略作综述。为叙述方便,拟分三个部分评述目前的研究现状。第一部分主要描述帛书《系辞》的研究情况,第二部分描述《二三子问》、《易之义》、《要》三篇的研究情况,第三部分综述《繆和》、《昭力》的研究现状。

一、帛书《系辞》研究综述

在帛书《系辞》的释文公布之前,已有几位先生的研究文章,他们在《系辞》的字数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文物》1974年第9期有署名晓菡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认为帛书《系辞》有六千余字,于豪亮先生的《帛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也持此观点。但是,韩仲民先生《帛书〈系辞〉浅说——兼论易传的编纂》(《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认为帛书《系辞》只有三千字,“子曰易之义”

以下是另一篇佚书,不能视之为《系辞》的下篇。持此观点的还有张立文先生,其文章刊载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8年号,三联书店1990年12月)。其后,王葆玟先生《从马王堆帛书本看〈系辞〉与老子学派的关系》(《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一文认为今本《系辞》“重卦”说自相矛盾,而如果依从韩、张二位的意见,帛书《系辞》则不存在这个矛盾,因此他肯定了韩、张二位的意见。

与帛书《系辞》释文同期刊发的有张岱年多位先生的研究文章,共计17篇,其它还有几篇研究帛书《周易》的文章也涉及到了《系辞》的研究,比如王葆玟的《帛书〈周易〉所属的文化地域及其与西汉经学一些流派的关系》一文,在学术史的视野下,对帛书《易传》诸篇所涉及到的学派问题做了分析。

从文本上看,帛书《系辞》与通行本《系辞》之间存在很多的异文,大部分异文是因音同或音近通假、同义替代造成的。两种《系辞》的几处关键异文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比如通行本中的“象”字,帛本都写作“马”、“易有太极”写作“易有大恒”等。饶宗颐先生《帛书〈系辞传〉‘易有大恒’说》一文详细考察了“大恒”、“太极”的意义,认为帛本作“易有大恒”是汉以前的《系辞传》的本来面目。余敦康先生所撰《帛书〈系辞〉‘易有大恒’的文化意蕴》认为太极原作大恒,这个范畴直接取之于老子所说的道,这对于弄清《易传》思想的学派属性会有极大的好处。陈鼓应先生的《〈系辞传〉的道论及太极、大恒说》认为“太极”源于《庄子》,帛书作“大恒”,更能显示它与老子的联系。对于帛书《系辞》的“马”字,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抄错,或形近而产生的讹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可能与某种避讳行为有关,第三

收稿日期: 2006-11-9

作者简介: 王化平(1976-),湖南邵阳人,西南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

种观点比较谨慎,仅对此现象表示“难以理解”。张岱年先生持第三种观点(见《初观帛书〈系辞〉》,朱伯崑先生《帛书本〈系辞〉文读后》一文则认为笔误,魏启鹏先生认为帛书写作“马”与南方的宗教避讳有关(见《帛书〈易传〉窥管》,《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中还有张政烺、黄沛荣、楼宇烈等先生的文章,对两种《系辞》间的异文进行校勘或疏证。连劭名《马王堆帛书〈系辞〉研究》(《周易研究》,2001年第4期)、《再论马王堆帛书〈系辞〉中的‘马’》(《周易研究》,2002年第3期)也对两种《系辞》之间的异文进行了分析,其分析有益于正确理解这些异文。

与通行本相比,帛书《系辞》缺少了不少内容,比如“大衍之数”章。“大衍之数”章不见于帛书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廖名春《‘大衍之数’与帛书〈系辞〉》(《中国文化》第9期,1994年)通过文献梳理,认为“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与“大衍之数”章存在密切的逻辑关系,帛书有前者,而无后者,是删节造成的。王葆玟《再论帛书〈系辞〉太极与大衍之数诸问题》(《国际易学研究》第二辑,华夏出版社,1996年)反驳了廖名春的观点,认为“大衍之数”与天地之数节之间不存在廖氏所称的逻辑联系。

在分析异文的基础上,两种《系辞》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众多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意见也可分为三种。一种观点认为帛书《系辞》可以证明通行本《系辞》的晚出,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另一种观点认为帛本是通行本的节抄本;第三种观点或者认为两者的关系很复杂,不能以晚出或节抄的眼光简单视之,或者对此问题保留谨慎态度。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以王葆玟诸位先生为主,王葆玟认为通行本《系辞》抄录了《易之义》的文字,是根据帛书《系辞》、《易之义》、和《要》篇改编纂集而成的(《帛书〈系辞〉与战国秦汉道家〈易〉学》,《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廖名春先生则持第二种观点,在《论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的关系》(同前)一文中,他在比较两种《系辞》之间异文的基础上认为帛书《系辞》的祖本非常接近通行本,帛本中少于通行本的章节、段落在其祖本中是存在的。他还分析了《易之义》和《要》的相关记载,认为《系辞》是这些记载的来源。总之,廖名春认为在帛书写作之时,通行本《系辞》的内容已经基本形成。同期发表的朱伯崑《帛书本〈系辞〉文读后》认为帛书本《系辞》文,在汉初,只是一种传本,并非唯一传本。《要》、《易之义》中与通行本《系辞》相同的文句,原有所本,是《系

辞》文,还是其它《易传》文,尚待考证。郭沂《帛书〈要〉篇考释》(《周易研究》,2004年第4期)认为《要》与《系辞》的关系较为复杂,不能简单视之。

帛书《系辞》的发表还引起了《系辞》乃至《易传》的学派归属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同样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可以将它们称为道家说、儒家说、自成一体说。陈鼓应、王葆玟两位力主帛书《系辞》是道家传本,《易传》属于道家系统。前文所引王葆玟的两篇文章和《从马王堆帛书本看〈系辞〉与老子学派的关系》、《帛书〈要〉与〈易之义〉的撰作时代及其与〈系辞〉的关系》等一系列文章或者提出,或者支持了帛书《系辞》是道家传本的观点。陈鼓应就《易传》属道家系统所发表的大部分文章收录在《易传与道家思想》(三联书店,1996年)一书中,该书系统阐发了其观点。廖名春、吕绍纲则坚持认为《系辞》是儒家作品,而非道家作品。廖名春的观点可以参见《论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哲学研究》1993年第7期)、《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的关系及其学派性质问题续论》(《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华夏出版社,1995年)两篇文章。吕绍纲《〈系辞传〉属儒不属道论》(《国际易学研究》第二辑,华夏出版社,1996年)从五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一、《系辞》所说“道”为儒家之“道”;二、太极或太恒不是道;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乃儒家本色;四、《系辞传》讲仁、义、礼、知等为儒家特色;五、帛书《周易》更证明《系辞传》思想确属孔子。余敦康认为《易传》在哲学思想上非道非儒,已经自成一体,《〈周易〉的思想精髓与价值理想》、《帛书〈系辞〉‘易有大恒’的文化意蕴》等论文都表达了这种观点。

二、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篇研究综述

自这三篇帛书《易传》公布至今已有十三年时间。在这十三年中,对诸篇帛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上述三篇帛书《易传》不能回避三篇文章,即廖名春先生的三篇“简说”,它们对帛书的形式、结构、思想、解易风格作了简略的说明。《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集中刊发了多名学者对帛书《易传》的研究成果。严灵峰《有关帛易传的几个问题》一文指出:“问、义、要三篇,非一家之学”,文章还指出《易之义》见于今本《说卦》的部分存有错简,至于“赞以德而占以义者”九卦,严先生认为“此段文字,与系辞传体例不类……其非系辞传本文,当可确定也”。依据《要》篇有关文字,严先生还认为“孔子亦重占、卜”,孔子论《易》与老子在“物极必反”上有共通之处。朱伯崑《帛书易传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将帛书《系辞》之外的几篇通称

为“帛书易说”，认为“这部分文献，其解易，多引用或阐述三传，即《彖》、《象》、《文言》文，当出于三传之后”、“帛书易说……是后来的儒家学者，依孔子当年解易的学风，对《周易》经传文所作的解释。理由是，‘孔子曰’中的术语、概念、命题等，不仅不见于孔孟的著作中，甚至于不见于《易传》中”、“关于帛书解易的学风，同后来的汉易学风相比，也有其特色……帛书本易说，《韩诗外传》、《淮南子》以及费氏易学解经的学风，都同荀派学风是一致的，不同于后来兴起的象数之学”、“帛书本易说……为研究秦汉易学史提供了新的史料”、“据帛书易说提供的资料，汉代今文经学与古经学的区别，不在于字体，而在于其内容。”李学勤《帛书〈易传〉与〈易经〉的作者》通过梳理传世文献和帛书易传，认为“《周易》经文与文王有关系确实是可能的”。张立文《帛书〈易传〉的时代和人文精神》从哲学的高度，对帛书《易传》所体现的人文精神进行了阐发，此外，该文还对帛书《易传》各篇的成书年代做了大致分析：“《二三子问》成书于春秋以后，是战国初期到中期的作品，即作于馯臂子弓之前或之时，由馯臂子弓传入楚”、“《易之义》的成书年代为战国中期”、“《要》的成书年代为战国中期稍后，与《易之义》相差较近。”与张立文先生不同，陈鼓应《〈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的撰作年代及其黄老思想》认为《二三子问》、《易之义》、《要》诸篇的撰作年代略为靠后，“三篇帛书为秦汉易学融合期作品”。此外，“三篇帛书非同一传系、同一作者之作品”，这与严灵峰先生的认识相同。在文章中，陈鼓应先生还对帛书《易传》中的黄老思想进行了发掘，认为“这三篇帛书《易》说……在思想方法、观照角度、思辨模式等方面与黄老道家有着息息相通之处”，“离析出其间所融汇的主要学派的思想内涵，这似乎是一项较重要的工作”。郑万耕在《帛书〈易传〉散议》一文中指出“帛书《周易》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否定了帛书本《易传》价值远在通行本之上的观点。郑先生还指出了《易之义》晚出的证据以及帛书《易传》引史证《易》、以五行学说解易等特点。

首家刊发三篇帛书《易传》的《道家文化研究》在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上同时刊发了几位学者的研究文章。朱伯崑《帛书本〈易〉说读后》一文坚持其《帛书易传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看法，认为“从内容上看，帛书《易》说不仅解释经文，而且解释传文，因而不属于《易传》。文中称引‘孔子’、‘子曰’，表明其属于儒家传易系统，且与荀学解《易》学风相致”、“它们用《彖》、《象》、《文言》的观点来解《易》，代表了汉初儒家解《易》的一种倾向，是《易传》发展到汉代易学

的过渡环节。”王博所撰《〈要〉篇略论》一文讨论了《要》篇主旨，及其与《易之义》的关系，认为《要》篇的年代当在“秦末汉初”，“作于秦火之后，或在汉初”。王博先生指出了《要》与荀学关系密切，但“前者受后者的影响并不能过高地被估计”。通过对《鶡冠子》与《要》篇的比较研究，邢文《〈鶡冠子〉与帛书〈要〉》发现《要》与《鶡冠子》相通之处甚多，进而认为“周汉之际学术发展的地域性非常显著”。王葆玟《帛书〈要〉与〈易之义〉的撰作时代及其与〈系辞〉的关系》在帛书撰作时代、学派归属诸方面提出了系统看法，认为《要》、《易之义》的作者生活在秦代焚书事件之后，“他们在焚书禁学的恐怖气氛中，不便采用其旧有的《诗》学或《书》学等形式，只好利用秦代未焚《易》类书籍的缝隙，用《易》学的形式来阐扬其一贯主张的‘德义’”、“帛书《系辞》、《要》与《易之义》，都是汉初儒者编纂通行本《系辞》所依据的原始素材”、“帛书《要》、《易之义》及《繆和》诸篇是秦代后期儒家鲁学的作品，其作者当是浮丘伯、穆生师弟团体中的人物。”

刘大钧主编的《大易集说》收录了几篇研究帛书《易传》的文章，如井海明的《简论帛书〈易传〉中的卦气思想》、张丽华的《帛书〈易之义〉的解易思想》。《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发表了三篇研究帛书《要》的论文：裘锡圭的《帛书〈要〉篇校读记》、邢文的《‘损益’与‘君道’》和《君道：‘天、地、民、神、时’的视角——从帛书〈周易〉五行说看〈要〉篇君道之论》。

以上是集中刊发的论文，另有多篇散见论文亦推动了帛书《易传》的研究。廖名春对帛书《易传》用力甚勤。刊于《中国文化》第十辑的《帛书释〈要〉》对《要》作了通篇分析，对《要》所涉及到的问题都有独到见解。此外，廖名春还撰文讨论了帛书《易传》与帛书《易经》的关系，利用《易之义》考证今本《说卦》的相关问题。饶宗颐先生的《论帛书〈要〉篇损益的天文意义：产道与产气》（此文现收录于《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三，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指出《要》篇损益之道的天文历法背景，对于理解《要》篇很有帮助。郭店楚简释文公布之后，帛书《易传》的研究稍为沉寂，但仍有多篇重要论文面世。刘大钧揭出了帛书《易传》中的象数思想，在《帛书〈易传〉中的象数易学思想》（《哲学研究》2001年第11期）一文中对《二三子问》中的孔子称龙、释乾坤二卦中的象数进行了分析。陈来在《帛书易传与先秦儒家易学之分派》（《周易研究》1999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在帛书各篇中，《系辞》着重在‘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易之义》着重在‘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要》篇则重在‘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各突出才。”刑

文《论帛书〈要〉篇巫史之辨》(《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利用《周礼》及官制材料研究了《要》篇中的巫史之辨。香港学者邓立光在《周易研究》上就帛书《易传》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帛书〈易传〉看孔子之〈易〉教及其象数》(1994年第3期)、《从帛书〈易传〉证知孔子说〈易〉引用古熟语》(1997年第3期)、《从帛书〈易传〉考察‘文言’的实义》(2002年第4期)。帛书《要》篇中的“六府”、“五官”、“五正”三个术语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梁韦弦的《释帛书易传〈要〉篇之‘六府’、‘五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3期),认为利用《鹖冠子》解释它们是不合的,以此推论《要》篇之卦气说也是不合理的。郭沂在《周易研究》(2004年第4期)发表了其整理的帛书《要》篇释文,综合了众家之长,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帛书《易传》的研究中,日本东京大学的池田知久教授开始得较早,成果亦颇为显著,在《周易研究》1995年第2期上,池田知久发表了《马王堆汉墓帛书〈要〉篇研究》,其整理的《要》篇释文,刊布在《周易研究》1997年第2期和第3期上(此二文均由牛建科译)。此外,《简帛研究译丛》(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一辑收录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成书年代》(陈建初译),其文章认为《要》篇成书较晚,当在公元前206年至前180年之间。

除了对帛书《易传》文本本身的研究外,有多位学者从帛书《易传》出发讨论了先秦学术史的相关问题,其中被讨论最多的是孔子的哲学思想和帛书《易传》与道家的关系,如:《从帛书〈易〉‘子曰’看孔子晚年的哲学思想》(赵士孝、刘怀惠,《周易研究》1998年第1期)、《孔子学易考论》(郭沂,《孔子研究》1997年第4期)等。上文已经介绍了讨论帛书《易传》与道家关系的文章,此处不赘。

综观以上著述,学界主要关注了以下问题:帛书《二三子问》诸篇与今本《易传》的关系、解易风格、成书年代、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学派归属、帛书在思想史或学术史上的意义。一些学者认为帛书诸篇与今本《易传》重出的部分抄自今本《系辞》、《说卦》,其学说与孔子关系密切(即不认为“子曰”全为假托),应是儒家的易学作品;有些学者则认为今本《易传》抄录自帛书《易传》,帛书中的孔子并非假托,与孔子的学问及其时代是相符的;还有学者认为帛书《易传》中有道家的作品,或系深受南方道家影响、儒道融贯的作品。在对帛书《二三子问》解易风格的认识上,意见较为统一,没有越出廖名春三篇“简说”:即以德义释卦,释卦多从《彖》、《象》、《文言》。刘大钧几位学者则认为帛书

《易传》释易时有象数思想,如《二三子问》释乾坤二卦的爻辞、《要》篇释损益二卦,并有将产生于汉代的卦气说上推至战国时代的倾向。在所有的论述中,金春峰先生的观点较为新颖,认为《二三子问》释卦不从《彖》,成书时间是很早的(参见《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一书,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年)。关于帛书《易传》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学者们主要注意《要》篇之于研究孔子与《易》之关系的价值、帛书《易传》与荀学的联系、《易之义》与《说卦》及相关问题。

三、帛书《繆和》、《昭力》研究综述

早在《繆和》、《昭力》的释文公开发表之前,《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就发表了廖名春的《帛书〈繆和〉、〈昭力〉简说》,这篇文章介绍了两篇帛书的基本结构和内容,并将有些内容与传世文献的记载相比,进行了疏辨,文章认为“《繆和》、《昭力》很少提到孔子,‘子曰’是经师之言,其思想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具有战国末期学术的特点”。《繆和》、《昭力》大部分内容是弟子与先生的对问记录和“子曰”领起的论《易》言论,因此,“子”是否就是孔子就成了讨论的焦点。丁四新先生撰《帛书〈繆和〉、〈昭力〉子曰辨》(《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3期)、《帛书〈繆和〉略论》(《鄱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论帛书〈繆和〉、〈昭力〉的内在分别及成书过程》(《周易研究》,2002年第3期)等文章,通过分析帛书的文本结构,判断其中有一处出现的“孔子曰”的“孔”字是抄写错误所致。但通过文献的比勘、思想的比较研究,发现两篇帛书与传世文献中的许多孔子言论在思想上是相通的,因此,他认为《繆和》、《昭力》中“子曰”之“子”就是孔子,繆和、昭力等人是孔子晚年的弟子,这两篇帛书是儒家的治《易》著作。

帛书《繆和》、《昭力》的思想也是研究的主题之一,《国际易学研究》第四辑上有韩国学者林亨锡的《帛书易传〈繆和〉篇的思想》,该文详细分析了《繆和》的思想,如帛书极为重视的“谦德”与“君道”之间的关系,认为“君道”的主要内容就是“谦德”;帛书篇后部分引历史事实解易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一个“危机与克服之模式”,这种“虽处困境,而能克服”的模式由人生的不安出发,引典型例子,强调尽为“劳谦”之德。文章还认为帛书《繆和》篇的学派性质无疑是属于黄老学派。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一书有一篇《帛书〈繆和〉、〈昭力〉中的老学与黄老思想之关系》,文章认为“《二三子问》、《易之义》、《要》这几篇古佚易说,若从学派性质来看,形式上是属于儒家的作品,然其中却渗

透着不少黄老思想；而《繆和》、《昭力》这两篇古佚易说，就出现了更为浓厚的黄老思想成分”，并逐条列出了帛书中的黄老思想，还指出其中的“子曰”是易师之言。

帛书《繆和》、《昭力》出土于楚地，而且其中的弟子，如繆和、昭力等，其姓氏都有楚国特点。此点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他们将这两篇帛书与荀子学派、汉初楚地的学术联系了起来。这方面的论述可以参看李学勤先生《周易经传溯源》一书的相关章节、王葆玟著《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八章以及王博《从帛书〈繆和篇〉到〈淮南子·繆称训〉》（《国际易学研究》第二辑）一文。

以上大致介绍了帛书《易传》的研究情况，由于学界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不能穷尽介绍，下面介绍几部论文集或专著，以便有志于研究帛书的读者阅览。李学勤先生很早就开始研究帛书《周易》，他的论文分别收集在以下的集子中：《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古文献论丛》（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周易经传溯源》（此书最早于1992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后又于1995年由台湾丽文文化公司出版，2006年由巴蜀书社出版了增订本），李学勤先生关于帛书《周易》研究的大部分论文都可以在上述集子中找到。廖名春先生在帛书《周易》的研究中也颇有建树，他的论文大致收录在《帛书易传初探》（台湾文史出版社，1998年）、《〈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齐鲁书社，2001年）两本书中，撰写的帛书《易传》的释文收录在《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和《易学集成》第3册中（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金春峰《〈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此书先由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于2003年出版，2004年又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收入了他关于帛书《周易》研究的大部分文章，对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的关系进行了全面梳理，认为《易之义》、《要》篇与今本《系辞》重出的部分是后者抄录前者。梁韦弦所撰帛书《易传》的论文收入其论文集《易学考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这些论文讨论到了帛书《易传》的内部关系、成书时代、卦气知

识等问题。郭沂先生的《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一书收录了他本人的部分论述帛书《易传》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编入该收的第一篇“孔子与《周易》”，讨论范围涉及到了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易传》的成书年代、学派性质等方面。

除了论文集，还有几部研究帛书《周易》的专著也不可不提。张立文的《帛书〈周易〉注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其中有部分内容论及了帛书《易传》。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湖南出版社，1987年初版，1995年出增订本）为六篇帛书《易传》做了详细疏证，是研究者不可不读的作品。刑文的博士论文《帛书〈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的部分章节讨论了帛书《易传》中的卦序、卦气说等问题。

参考文献：

- [1]陈鼓应. 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2]陈鼓应. 道家文化研究（第六辑）[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3]朱伯崑. 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C].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 [4]朱伯崑. 国际易学研究（第二辑）[C].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
- [5]朱伯崑. 国际易学研究（第四辑）[C].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 [6]李学勤. 失落的文明[C].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 [7]李学勤. 古文献论丛[C].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 [8]李学勤. 简帛佚籍与学术史[C].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 [9]李学勤. 周易经传溯源[C]. 成都：巴蜀书社，2006.
- [10]廖名春. 帛书易传初探[C]. 台湾：文史出版社，1998.
- [11]廖名春. 《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M]. 济南：齐鲁书社，2001.
- [12]金春峰. 《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C]. 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
- [13]梁韦弦. 易学考论[C].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 [14]张立文. 帛书《周易》注释[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 [15]邓球柏. 帛书《周易》校释[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 [16]刑文. 帛书《周易》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Summary of research on silk book Yizhuan

Wang Hua-p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and language, Xinan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This text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survey of study of Xici which copied on silk, the survey of study of Ersanziwen, Yizhiyi and Yao which copied on silk and the survey of study of Miaohe and Zhaoli which copied on silk. In every part, the article regards studying the theme as the clue to introduce the research results. At last, the article introduces some collections of theses and monographs about Zhouyi which copied on silk.

Key words: Xici which copied on silk Ersanziwen Yizhiyi Yao Miaohe Zhaoli

(责任编辑：陈剑)